

第九講 美國獨立

- 一、獨立戰爭的背景
- 二、戰爭的爆發
- 三、美國獲勝的原因
- 四、作為歷史轉捩點的意義

一場偉大的革命已經產生——這一場革命的發生不是由於任何現存國家中力量的變化，而是由於在世界的一個新地方出現了一個新種類的國家，它已在所有的力量關係、力量均勢和力量趨勢方面引起一個巨大變化，就像一個行星的出現會在太陽系中引起一個巨大變化一樣。

——愛德蒙·伯克，《法國革命論》

一、獨立戰爭的背景

（一）航海法

十七世紀中葉起，英國政府在重商主義的原則下，公布一系列合稱為「航海法案」（The Navigation Acts）以管理殖民地事務。這些法案包括幾項基本要點：1. 只有英國或殖民地人民所擁有、製造或行駛的船隻可以裝運英國殖民地的貨物，其他船隻不准參與殖民地貿易；2. 若干經政府指定的殖民地產品只准運銷到英國本土或其他英屬殖民地，這些產品包括煙草、糖、棉花、靛青、生薑、染料木、海運造船原料、銅與毛皮等；3. 禁止從英國以外的歐洲國家將製造品直接運銷殖民地；4. 控制殖民地製造事業，即限制殖民地生產與母國有競爭性的產品，如紡織品與鐵器，而鼓勵殖民地生產母國需要的產品如造船用的松脂、瀝青、船桅，船桁與生鐵等。這些規定的目的，顯然是為了使殖民地為母國的經濟利益服務，使英國政府、商人與人民都可直接或間接的從殖民地獲利。航海法對殖民地甚為不利，但由於三千英里海路所造成的交通困難、十七世紀英國政治的動盪不安、光榮革命後英王與國會對殖民地統治權的混淆不清、英王與國會對殖民地缺乏興趣，以及英國政府缺乏一

個管理殖民地的有效專責機構等因素，都使航海法案實際上無法嚴格地執行。因此，在十八世紀中期以前，除了偶一關注之外，英國政府對殖民地大致上是置而不問的。

一七五六到一七六三年，英、法兩國因爭奪殖民地而發生七年戰爭。這次戰爭在北美殖民地上稱為「法國與印第安戰爭」（The French and Indian War）。由於戰敗，法國在一七六三年締訂的「巴黎和約」中正式將北美殖民地全部讓給英國，使英國在北美的殖民地幾乎增加了一倍。但是英國為贏得這片廣大的土地，卻欠下了巨額的國債。同時，新獲得的土地也需駐軍戍守，以防止法人與紅人死灰復燃。駐軍需要補給，國債也要償還，英國政府必須設法增加收入才可應付。為了解決這個財政上的困難，英王的大臣們想到了殖民地。國債既是為殖民地利益而欠，駐軍既是為殖民地安全而設，要求殖民地負擔一部分費用自是名正言順之事。因此，開始在殖民地加強徵稅。但是這一個解決財政的方法，最後卻斷送了北美大陸。

（二）衝突情勢的升高——三法案

「法國與印第安戰爭」之後，英王喬治二世任命擅長理財的格林威爾（George Grenville）為財政大臣，負責解決英國政府所面臨的財政困難。他就職後採取一連串相關措施，命令殖民地海關加強徵稅，派遣海軍巡邏殖民地沿岸取締走私。自一七六三年四月到次年五月，他促請國會先後通過三個法案加強在殖民地的收稅。首先，「蔗糖法案」（The Sugar Act）作了四項重要的規定：1. 將糖蜜的關稅從一加侖六便士降為三便士（他以為六便士確實太高，殖民地人民只好走私或行賄。將之降為三便士，要比行賄所需為低，商人就會規規矩矩的繳稅）；2. 凡輸入殖民地的糖、靛青、咖啡、酒、甘椒與紡織品都須繳納關稅；3. 為防止走私，採用一套非常複雜的報關手續；4. 凡是違反關稅規定的人都須在沒有陪審團的海事法庭（Admiralty Courts）中受審。其次，「印花稅法案」（The Stamp Act）規定殖民地人民必須在一切法律文件、報紙、紙牌、曆書與骰子上貼印花稅票。最後是「駐軍法案」（The Quartering Act），要求各殖民地須為駐紮其境內的英軍提供營房及一些日用品。這三個法案立即引起殖民地人民的不滿。糖蜜稅雖降為一加侖三便士，但比行賄要高，商人仍難接受。新報關手續過分複雜，商人一不小心就會犯錯受罰，船貨兩失。但是最使殖民地人民難以忍受的是，他們認為英國政府顯然已不再把殖民地人民視為英國公民。他們堅信殖民地人民與英國本土的人民一樣，也享有未經他們選舉的代表同意就無人可以向他們徵稅的權利，但現在國會卻以印花稅法案向他們直接徵稅，以駐軍法案與蔗糖法案向他們間接徵稅。此外，違反蔗糖法案的人必須在海事

法庭受審，也使殖民地人民覺得被剝奪了在陪審團面前受審的公民權利。

殖民地的抗拒、英國工商人士的請求，以及英國政府的改組，終於使國會在一七六六年三月撤銷了印花稅法案。雖然國會同時也通過了一個「宣言法案」，重申國會制訂任何有關殖民地法案的權力，但在一片和樂友好的氣氛中，也就無人去理會它所含有的不祥之兆。

（三）波士頓大屠殺

一七六六年七月，湯森（Charles Townshend）就任英國財政大臣，負責籌措稅收。他也把腦筋動在殖民地身上。一七六七年，他促請國會通過一連串法案，對輸入殖民地的鉛、染料、紙張、玻璃與茶課徵入口稅，否定了殖民地堅持國會無權在殖民地徵稅的原則。湯森同時也改組了殖民地的海關，以確保新稅的徵收。他在波士頓設立一個「特別關稅委員會」就近監督管理海關收稅。殖民地對湯森法案的反應溫和而堅決。各殖民地議會再度否認國會在殖民地徵稅之權；商人們再度抵制英貨；而自由之子們也再度監督抵制行動的徹底執行。在緊張的對峙之中，終於發生了流血事件。一七七〇年三月五日，一群波士頓暴民集聚在海關之前戲弄嘲笑站崗的英軍士兵。英兵受不了侮辱，憤而開槍。結果暴民五死六傷。這件在美國史上被稱為「波士頓大屠殺」的事件，自然更大大加深了殖民地對母國的仇恨。

（四）茶葉法案

與此同時，英國的工商人士正致力於撤銷湯森法案。最後，一七七〇年正月剛就任財政大臣的諾斯（Lord North）建議除了茶稅之外，湯森法案的其他稅目一律廢除。這樣既可保持國會徵稅之權，也可使嗜茶的殖民地人民為滿足口腹之欲而不得不繳稅，國會通過了他的建議。湯森稅的撤銷恢復了殖民地對母國的好感。商人再度輸入英貨，貿易也再度繁榮。事實上，只要關稅委員會繼續留在波士頓，只要英國海軍繼續巡邏沿海，只要海事法繼續沒收殖民地人民的船貨，殖民地對母國的懷疑反感就不會完全消滅。所以，即使在此和樂融洽時期，一些激進分子如維琴尼亞的亨利（Patrick Henry）與麻薩諸塞的亞當斯（Samuel Adams）等人，仍能以殖民地權利或國會專制的問題繼續煽動人民的視聽。就在亞當斯的推動之下，麻薩諸塞各個村鎮紛紛組織委員會起草各種伸張殖民地權利的文件，以及彼此互通消息。一七七三年，由於維琴尼亞議會的建議，這種「通訊委員會」的組織也推廣到其他殖民地去。其後，這些民間組織就成為協調各殖民觀點與行動的主要工具，在美國革

命與建國的過程中發生重大的作用。

當亨利、亞當斯與其他激進分子為殖民地的團結一致奠立基礎時，諾斯則正在為解決東印度公司的財務困難傷腦筋。他最後想出的辦法是利用北美殖民地的嗜茶習慣。一七七三年五月，他促請國會通過「茶葉法案」。此一法案准許東印度公司將其庫存的茶葉直運北美殖民地，經由公司的銷售網直接賣給消費者，因為免除了中間商人的利益及部分關稅（輸入英國的部分），東印度公司的茶價大為降低，即使加上輸入殖民地的入口稅，茶價還仍比非公司茶為低。依諾斯的預計，殖民地人民必定會爭飲公司茶。如此一來，不但東印度公司的財務困難可以解決，而且也可迫使殖民地默認茶稅與國會的徵稅權。但是諾斯顯然過分高估了殖民地人民飲茶的嗜好，而過分低估了他們保持其既有權利的決心。殖民地堅決地反對東印度公司的茶在當地銷售。當第一批公司茶到達時，暴民們不是迫使原船駛回，就是只准將茶葉存放在倉庫裏，不得運出。但在波士頓，亞當斯與他的同伴們卻在一七七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乘夜登船，將茶葉全部倒進海裏去了。

（五）懲罰波士頓

在此次「波士頓茶黨」事件之後，諾斯決定懲罰桀驁不馴的波士頓。他促使國會通過幾個法案：關閉波士頓港直到該港賠償茶價、限制麻薩諸塞的自治權、任何政府或海關官員如被控謀殺，可移回英國受審，以擺脫當地陪審團的左右，以及授權軍事指揮官可視情況需要，駐軍於任何村鎮。為了有效的執行這些被殖民地人民稱之為「不可忍受的法案」，英政府任命蓋奇將軍（General Thomas Gage）為麻薩諸塞的總督，並率軍進駐波士頓。這些法案與軍事行動雖只針對麻薩諸塞一地而發，但諾斯顯有殺雞儆猴之意，企圖以屈服麻薩諸塞來教訓其他殖民地承認國會對殖民地的最高統治權，包括徵稅權在內。

各殖民地的通訊委員會立刻發動聲援，同時也安排召開殖民地代表會議，商討應付之道。一七七四年九月來自十二個殖民地（喬治亞未派人參加）的五十五位代表齊聚集費城。第一次「大陸會議」決議抗拒「不可忍受的法案」，並對英國及英屬西印度群島實施貿易抵制。大會也通過決議，正式否認國會對殖民地有任何的統治權，但如國會的法案僅為管理貿易，殖民地可以接受。這些決議的義涵實際上是建議英國政府重新恢復以前的角色——即監督而非統治。英國政府無意接受此一建議，所以對大陸會議的決議未作任何表示，仍堅持執行「不可忍受的法案」。英國政府顯然不打算對殖民地作任何讓步，必要時，甚至不惜一戰。

二、戰爭的爆發

殖民地預料武力衝突難免，開始做必要的準備。麻薩諸塞各地民兵在激進分子領導下儲集武器彈藥。蓋奇知道這事，但未立即採取行動。一七七五年四月中英國政府命令伺機剿平叛民，十九日他派遣一支英軍到康考德去沒收彈藥。英軍乘夜自波士頓出發，走到半途的勒克辛頓時，適逢當地民兵集合晨操。英軍隊長下令民兵解散，民兵起初也奉命惟謹，但在解散之中，不知誰突然放了一槍，這一槍開啟了美國獨立戰爭的序幕。

波士頓武力衝突事件爆發之後，各殖民地紛紛響應。面對這種跡近叛亂的抗議，各殖民地的總督先後逃亡。原有的皇家政府垮台之後，各殖民地的代表議會順理成章的代行統治權而成為臨時政府，並著手招兵徵稅，為戰爭做準備。為了謀求採取聯合行動，各殖民地議會推派代表於五月在費城舉行第二次大陸會議。這次大陸會議開幕之後，立即將集聚在波士頓外的民兵編組為正式的國家軍隊，號稱「大陸陸軍」，以華盛頓為總司令。直到此時，殖民地人民還只是反對英國國會的專制統治，並不想別建新國。因此，七月中，大陸會議向英王提出一分請願書，要求撤銷各種迫害的法案。他們保證只要英國承認殖民地的權利，他們就立即放下武器。但英國已下定決心以武力屈服殖民地，英王不但拒絕殖民地的請願，並且增派軍隊馳援已在殖民地的英軍。八月，英國政府正式宣布殖民地處於叛亂的狀態中，並關閉了殖民地對外的貿易和交通。

（一）獨立宣言

英國堅不讓步，殖民地也日趨極端。如南卡洛萊那早在三月就已制訂一部共和政體的憲法，這無異獨立；羅德島則撤銷須效忠英王的法律；在四月與五月，北卡洛萊那與維琴尼亞即訓令其代表正式向大陸會議建議獨立。七月二日大陸會議即通過獨立的決議。但為向全世界昭告此一決定，代表們推派五人組成一個委員會，負責起草一份獨立宣言。實際起草工作由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擔任。七月四日大陸會議予以通過，並向全世界宣布。

美國的「獨立宣言」是人類爭取自由民主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獻。全文大致可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前言，說明發布宣言的理由。第二部分說明宣布採取的理論基礎。它開宗明義說，人生而有一些不可剝奪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組成政府，其統治權是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故當政府不能達成其組成的目標時，人

民就有權加以改組或推翻，建立一個更能保障其權利的新政府。這雖然是洛克（John Locke）自然權利論的翻版，但是卻沒有其他的文字將民主的真諦像「獨立宣言」這樣簡潔有力的陳述清楚。所以這短短一百多字竟成為美國，甚至全人類嚮往民主自由的啟示源泉。第三部分則是列舉了英王的罪行，以證明英國政府不但未能善盡其保障人民權利之責，反加迫害，已不配為政府。第四部分是向全世界正式宣布十三個殖民地斷絕與英國的一切關係，並組成美利堅合眾國。

獨立既經正式宣布，戰爭的意義則為之改變。在此之前，殖民地只是為了反抗英國的專制而戰；此後則是為了建國而戰。這一轉變大大振奮了美國的民心士氣，有更大的決心堅持到底。

（二）華盛頓的危機

大陸軍組成後，由維吉尼亞華盛頓統領。此時的大陸軍未經訓練，缺乏領導，也無組織。華盛頓吃驚地發現很多幹部是無賴，既無能又膽小。要將這群新英格蘭人磨練成軍人，對華盛頓而言是嚴厲的挑戰。直到後來有一些歐洲軍官自願到美洲加入大陸軍服役，才使大陸軍的訓練與軍紀上軌道。但華盛頓更大的困擾是要不斷應付永遠缺乏彈藥、糧食、兵源、金錢的問題和根深蒂固的地域觀念。大陸議會印的紙幣不值錢，幾乎等於廢紙，也不敢徵稅，因為怕人民反對。而兵源的問題是：役期只一年。役期一結束，不管華盛頓訴諸愛國心或配給更多的甜酒，很少人願意延長役期。譬如一七七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圍攻波士頓的士兵役期已滿，結果當天士兵不顧戰況立刻收拾行李回家，整個軍營如同搬家，好像戰爭已經結束。華盛頓沒想到，他所期待領導的「為自由而戰」的「自由人」如此欠缺克己為公的精神和美德。他們愛好自由，也討厭當兵的不自由。幸好有新英格蘭的民兵和義勇軍填補，戰力才得以維繫。整體而言，獨立革命戰爭初期，美軍什麼都沒有，有的只是「為自由而戰」的理想和「自由人必定戰勝自由的敵人」的信念。圍攻波士頓時，許多士兵只有既短且輕的矛和斧頭。一七七五年寒冬，華盛頓退守近郊福吉谷，士兵吃不飽也領不到薪水，衣不蔽體也無鞋穿，活像一群稻草人，據估計餓死凍死的達二千五百人，馬也餓死超過一千五百匹。問題並不是殖民地窮，而在於人民的冷漠和運輸補給出問題，此時社會各階層都狂熱於做生意謀取暴利。賓州則是親英忠王，在很多的方面，例如費城的上流社會，仍然歌舞昇平。不過這惡劣的環境卻造就了堅忍不拔的美軍，福吉谷成為逆境中美國勇氣的象徵。

經濟上也好不到那裏去。硬幣消失，紙幣不值其票面所值。州政府無效率，在

絕望中以增稅解決問題；但是人民太窮而且無組織，所以徵不出稅。一七八〇年，在六十幾個縣中，繳稅的縣不到半數。軍需官和募兵官幾乎全然靠搶劫維生。傑弗遜愛好和平，設法折衷和解與維持憲政秩序。面對戰爭暴力的事實，他心理上毫無準備。他好像對情況的嚴重性一無認知，當立法機關建議大幅降低州的軍建經費時，他也默許通過。傑弗遜必須提供給華盛頓在北方及蓋茲在南方的軍需。他最需要錢，而且他最短缺的也正是錢。華盛頓的軍隊既缺兵源也缺物資，他每月至少寫兩封信向傑弗遜抱怨並懇求幫助。

就產業而言，美國獨立革命戰爭時，美方人口約二百五十萬，九成是農業人口。英方約九百萬人口，其製造業的資源、備戰、應戰和支持戰爭的能力，都遠遠超過美方。英方有強大的艦隊和陸軍，美方卻連火藥都要由法國走私進口。在此情勢下，戰爭的頭三年，沒有任何國家公開支持「美獨」，只有看不清事實和熱愛自由的人才敢和英國打仗。

（三）英國的失敗

相較於美國困窘的形勢，英國人本來可說是穩操勝券，但因為種種因素，情勢終於逆轉。一般而言，派去美洲的英軍將領都年輕優秀。英軍是高度訓練有素的職業正規軍，他們在歐洲戰場具有優勢，不過在廣闊的美洲森林裏卻未必能發揮戰力。與中規中矩的英軍相比，美軍像印地安人，善用地形地物，拔槍快而且射擊較準確，加上英軍的紅色制服鮮明醒目，容易瞄準，其指揮官更成為顯著的射擊標靶。遙遠的運輸補給也是英軍的大問題，三千哩的長途遠航造成兵疲馬困，大批家眷隨行也非常耗費軍需。英將威廉·豪（William Howe）用兵之所以延誤時機，其原因之一便是運輸補給的問題造成英軍無法乘勝追擊，這是英方敗戰的重要原因。¹

（四）撒拉托加的勝利

英軍的另一個問題是過於自信。訓練有素的英軍視美軍為一群叛亂的無賴，再加上初期戰役的順利，更增添了英軍的信心。美軍攻打魁北克失敗後，英將伯戈因（John Burgoyne）帶著精銳的兩棲部隊追逐潰散的美軍。他的路線在報上登了出來，就是出於自信與輕敵，他未走水路而入森林沼澤地帶，結果美軍毀橋、斷木擋路，迫使他造了四十多座便橋，結果二十哩路走了二十天。隨行的大批家眷與運輸補給問題，加上預定在紐約州會合三面夾攻的計畫未實現，導致一七七七年伯戈因在紐

¹ 有關獨立戰爭時美軍的作戰方式，可以看梅爾吉勃遜的電影《決戰時刻》，他所飾演的摩根上校是真實的歷史人物。摩根上校和格林將軍所率領的民兵在南方戰線拖垮了英軍。

約州的撒拉托加慘敗，六千人被俘投降。這是美國獨立戰爭的轉機。福蘭克林終於能使法國國王相信英國有被打敗的可能，一七七八年二月法美結盟，後來西班牙和荷蘭也提供海軍支持，法國的金錢與物資源源而來，更重要的是僅次於英國的法國艦隊投入戰爭，這是戰勝的重要關鍵。從一七八一年的春天到夏天，戰爭的決定性局面已經來臨。獲得海軍上將格拉斯（Grasse）率領法國強大艦隊的支援，華盛頓與法軍將領羅尚博（Rochambeau）的軍隊於九月三十日攻占約克頓。十月十九日，英軍投降，獨立戰爭終於結束。

三、美國獲勝的原因

美國獲勝的原因除了堅定的決心與法軍的支援之外，還有其他的原因。在開戰之初，除了革命分子外，大概很少有人預期美國會贏，因為英國太強大了。它有訓練精良的軍隊，有經驗豐富的軍官，有舉世無匹的海軍。相反的，美國卻只有缺乏訓練的民兵，缺乏經驗的軍官，裝備補給不良，更沒有海軍。兩國作戰的能力幾乎完全不成比例。但實際上，英軍所面臨的一些困難，卻完全抵消了它具有的優勢。三千英里的海上距離使補給、支援、指揮的效能都大打折扣。英軍在殖民地上最多時也不過四萬二千人。這樣少的兵力在一千英里長的疆域上作戰，兵力分散。這些困難已使英軍由優轉劣。何況美國的特殊環境與美軍的作戰方式對英軍尤其不利。獨立之初，十三個獨立的州，都缺乏能扼全州命脈的重要中心，因此英軍無法佔領一、二重鎮後迫使美國屈服。英軍既無法以攻城掠地取勝，就只有消滅美國的主力部隊。但是當時美國是全民參戰，除了華盛頓的陸軍可算是正規軍外，其餘都是小部分民兵或較大的民兵集結。華盛頓用兵謹慎，沒有把握絕不與英軍正面作戰，因此英軍無法將之殲滅。當英軍主力與華盛頓在東部沿海地區相持不下時，其他英軍則須與民兵周旋。美國民兵固然缺乏作戰的訓練與經驗，也不耐煩命令與軍紀的束縛，但他們長期與印第安人爭鬥所訓練出來的伏擊、偷襲等非正規戰鬥技術，卻非正規作戰的英軍所能應付。由於這些原因，在總體戰力上，美國雖遠非英國之比，但殖民地的戰鬥卻對美國日趨有利。尤其是在美、法同盟條約一七七八年二月簽訂後，法國的援助（包括物資、金錢、軍隊）源源來到美國，更確保了美國的最後勝利。因此，當屯駐在維琴尼亞州約克頓英軍主力為美法聯軍所迫，於一七八一年十月十九日向華盛頓投降時，英國在殖民地上已無可為，英國政府只好尋求議和，並在一七八三年簽訂的巴黎和約中正式承認美國獨立。經過七年的苦戰，美國的獨立

成為事實。

四、作為歷史轉捩點的意義

關於美國獨立革命的原因與意義，歷來美國史學家的意見極為分歧。早期史家大都認為，獨立戰爭是由美國的愛國心對自由平等的愛好所引發的反抗英國專制之戰。班克羅夫（George Bancroft）相信美國革命是上帝意志實現。上帝以北美授予美國人進行偉大的民主實驗，革命建國只是實現此一上帝設計的一步驟。盛行於二十世紀前半期的進步史家堅持「雙重革命論」。他們確信革命是由各殖民地地下階級所發動，既向英國爭獨立，也向內部的統治階層爭平等的參政權，所以具有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的雙重意義。這一雙重革命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受到一輩保守史家的嚴格批評。他們指出革命不限於任何一階層，因此革命的社會意義並不明顯，殖民地人民之所以走上革命的不歸路，純粹是因為發現除了脫離英國之外，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可以保持他們久已享有的自治權利。這些看法孰是孰非，此處無法詳論。但如從動機而言，殖民地期的反抗可能有經濟利益的原因，但後來，確保自治成為殖民地最重要的考慮。如只為經濟利益，在湯森撤銷茶稅以外的其他稅收時，殖民地人民應可妥協。他們之繼續抗拒正因為他們認清茶稅雖輕，卻象徵著英國國會在殖民地徵稅之權。由於涉及原則之爭，所以妥協讓步已不可能。因此，合而言之，美國革命外爭獨立的政治意義應大於內爭平等的社會意義與維持繁榮貿易的經濟意義。

美國革命還包含創建統一國家的工作。在此之前，十三個殖民地各自與英國政府產生關係，彼此之間甚少有橫向的聯絡。合作與聯合行動在反抗英國加強統治之後才常有。因為如此，獨立宣言雖以美利堅合眾國名義發表，但空名大於實際，因為初獨立時的十三州無異獨立國，大陸會議無異同盟國的代表會議。伴隨獨立而生的工作，是如何將此十三個原來彼此不相統屬的個體組成真正統一的國家。而這工作不是一蹴可及。事實上，其後又經過了八十餘年的紛爭與另一次更大規模的流血衝突之後，建立真正統一國家的工作才算完成。

（一）新的統治原理

從世界歷史的觀點看，美國革命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創造了一個依據新的統治原理而建立的國家。宣告一個政治體制無效，另設一個新體制取代，乃是根據啟

蒙運動一個典型的主題：「政府存在的目的何在？」「政府是不是做到了應該做的事？」但在美國獨立之前，啟蒙運動的諸多假設，從來只是理論上的探討，而無人（包括倡者在內）認真思考建立依據理論而生的新國家。然而美國獨立卻必須面對這個課題。獨立宣言列舉民怨，就是要彰示英國在北美的作為，連一個好政府的起碼標準也達不到，從而為建立新的統治原理提供依據。宣言肯定人有追求幸福的權利，就是以一般人的幸福為政府的當務之急。這意思不是說，政府因此應該巨細靡遺的管理人民所有活動，而是說政府有責任提供條件，使有理性的人可以追求幸福，同時不受政府或他人不必要的干涉。這是統治原理上一個重大的改變。自《聖經》以來，大多數政府並不宣稱其統治的正當性基礎在於是否能創造幸福，不直接以增進幸福的能力作為統治正當性的基礎，因為若這樣做，等於給人民評判政府是否勝任的標準。柏拉圖以來的政治理論，可以說大都特意將幸福與正當性問題一分为二。這其中不免有兩面取巧之嫌：倘若某理論提倡的統治型態的確增進了人民的幸福，理論家就自以為是；倘若情形不如人意，就又強調所謂正當性並不以幸福為基礎。然而人權宣言卻明白將正當性與幸福的追求直接掛勾，提出生命、自由、幸福三大權利，而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保障這些權利。這種觀念的提出，影響是十分深遠的，它使日後所有統治型態，都不能宣稱本身即具有正當性，而至少必須費盡苦心證明自己是為人民福祉而存在。因為上述革命統治原理的提出，人們就有了反抗暴政絕對而無限制的權力，與獨立宣言同樣重要，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識》發揮了這點，由於目睹獨立戰爭期間，英國政府統治雖然瓦解，但北美社會依然運作的事實，使他擺脫自霍布斯以來假定的自然狀態人將相食的說法。他指出，社會自有其積極追求幸福的能力，政府只是用來消極的遏制人類少數的惡行，即使在最佳狀態下，政府也只是必要之惡，所以如果當政府不但不能遏制惡行，本身還成為罪惡的來源，就應該堅決推翻它。他這種觀點，對於最初猶豫不決，不知應否獨立的北美人民，具有很大的影響。華盛頓就是讀了潘恩的《常識》，才決心投入獨立戰爭。

美國人的獨立，為世界各地的改革者帶來鼓舞，其所捍衛的諸多權利，如宗教信仰自由、集會自由、出版自由、不受任意扣押的自由，都成為後來歐洲革命立憲，打倒專制君王的重要依據。譬如後來法國〈人權宣言〉的起草委員會便承認：「這一崇高的思想產生於美洲，在美洲確立起自由的那些事件中，我們攜手合作。北美洲啟示了我們究竟要基於什麼樣的原則來捍衛自己。」更重要的是美國已成為自由和機會的一個象徵，它作為一個沒有數千年包袱卻擁有廣大土地的國家而受人欽

羨。德國音樂家舒伯特（Franz Peter Schubert）便宣稱：「在美國，十三扇金色的大門向不容異說和專制政治的受害者敞開著。」

（二）天賦人權的理想

進而言之，這個國家的創新之處正在於它背後有種自覺的精神。美國人深信自己揚棄了人類史上存在過的種種政治形式，人類史將自此展開新頁。自開天闢地以來，人們受制於國王和祭司的統治，文明社會的政治地位都是世襲而得，個人的存在乃是為了社群與國家統治者的利益。但是自切斷與英王喬治三世乃至大布列顛的臍帶之際，美國人不僅向暴虐的君王統治說不，更是向創世以來一切的政治體制挑戰。當然，它們也向史上熟知的少數共和體借鏡；儘管如此，它們的體系仍有獨特之處，因為完全奠基於「天賦人權」的理念之上。基於這種精神，美國人理直氣壯地宣揚「個人至上」的觀點，這種想法雖然有時略顯幼稚，但與法國大革命為廣大人民的共同願望而戰，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要讓勞動階級出頭天，納粹德國為保護優等民族的「理念」相較，美國革命的精神確實有其獨特的價值，象徵著對個人價值的肯定，也進一步形成了人道與人權等普世價值。

（三）美國獨立進步意義的侷限性

在讚揚美國獨立對世界歷史的貢獻時，有三點是經常容易被誤解而須特別注意的。一是美國的獨立在一開始並沒有明確的民族認同，甚至於在建國之後也沒有萬眾一心的氣象。與其說美國人生來愛好自由民主，不甘被壓迫因而獨立建國；不如說美國在建國之初，因為根本沒有強固的民族意識，因此不得不訴求高遠的民主、自由理想以作為民族認同的號召（甚至於圖騰）。在這個意義上，五月花號上的那批英格蘭移民的正面形象往往也被過度的誇大，事實上那條船上的許多人只不過是臨時為了湊數以開船的無賴或罪犯，與所謂冒險、獨立之精神其實毫不相干。

第二個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的獨立並不意味著美洲大陸成為多元民族的樂土。事實上，美國在建國之後對於少數民族的迫害，並不比英國人對美國人的壓迫少（正如歷史所常見，一個民族的獨立往往是國內其他種族苦難的開始。）尤其在西部開拓時，美國人冒險犯難的牛仔形象背後往往是對原住民印地安人殘酷的屠殺，它迫使印地安人拋家棄子遠離家園。而美國自印地安人手中奪取的大量土地，卻成為日後發展小農經濟的重要基礎。這是美國人在高唱自給自足和平高貴的自耕農情懷時所刻意忘記的。因此我們必須謹記，美國革命自始自終都是一個有限度的革命，一

個將權力限制在白人地主階級的革命。

最後我們必須知道，美國革命所代表的諸多精神，之所以為今日世界所讚揚，其背後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美國的勢力籠罩了今日的世界。在美國勢力所及之處，資本主義成為當地秩序的核心，而個人自由等美國革命所頌揚的精神，其實正是為了配合資本主義下消費習慣的一種價值觀。其它如自由貿易、民主政府等美國念茲在茲的普世價值，說到底也是為了美國人在各地的利益。因此在讚揚美國革命所帶來光明意義之時，也有必要了解那些黑暗的一面，對於現代世界的形成才能有一個公正的評價。

§ 參考文獻

- 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上海：社會科學，1988）。
- 麥克里蘭（JS McClelland），彭懷棟譯，《西洋政治思想史》（臺北：商周，2000）。
- 大衛·弗羅姆金，《世界之道：從文明的曙光到二十一世紀》（臺北：究竟，2000）。
- 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民主與獨裁的社會起源》（臺北：桂冠，1991）。
- 富勒（Fuller JF）著，鈕先鍾譯，《西洋世界軍事史》（臺北：軍事譯粹社，1968）。
- 楊泰順，〈美國人認同的形成〉《美歐季刊》14卷2期（2000，臺北）。
- 林茗顯，〈美國的獨立革命〉，《共和國雜誌》8、9期（1999，臺北）。
- 孫同助，〈美國的獨立革命〉，《歷史月刊》18期（1989，臺北）。

§ 思考問題

1. 歐洲各國為何要協助美國的獨立戰爭？
2. 美國革命與今日的世界有何關連？
3. 美國獨立雖然使自由民主人權價值得以彰顯，美國也經常以這些價值評斷其他國家，甚至據此理由干涉他國內政。然而衡諸美國過去的相關行動，如越戰、出兵格瑞那達，或者伊拉克戰爭等，是否合乎美國所標榜的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試思考美國價值的理想與實際，以及前者與美國利益之間的糾葛關係。

§ 延伸閱讀

謝沃斯季揚諾夫主編，桂史林等譯，《美國現代史綱》（北京：三聯書店，1977）。

艾倫·亞瑟羅德著，賈士蘅譯，《美國史》（臺北：臺灣商務，2005）。

湯瑪斯·潘恩著，馬清槐譯，《潘恩選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J.卡爾頓點評，《美國賴以立國的文本：照亮了美利堅民族歷史與性格的文獻匯編》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史托夫人著，黃繼忠譯，《湯姆叔叔的小屋》（臺北：桂冠，1994）。

威爾科姆·E·沃什泊恩，《美國印第安人》（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